

影响当今中国
发展进程的人

之七

中国 高层智囊

张明高等著



张其成 / 著

中国 高层智囊



图书代号: SK216000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高层智囊 .7、8/张晓霞著. -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5

ISBN 7 - 5613 - 2262 - 3

I . 中… II . 张… III . 名人 - 生平事迹 - 中国 - 现代
IV .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34877 号

责任编辑: 周宏

中国高层智囊

——影响当今中国发展进程的人之七、八

张晓霞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南郊吴家坟 邮政编码: 710062)

北京市黄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销

200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9.25 印张 字数: 480千字

定价: 39.60元

ISBN 7 - 5613 - 2262 - 3/K · 117

开户行: 西安工行小寨分理处 账号: 216 - 144610 - 44 - 8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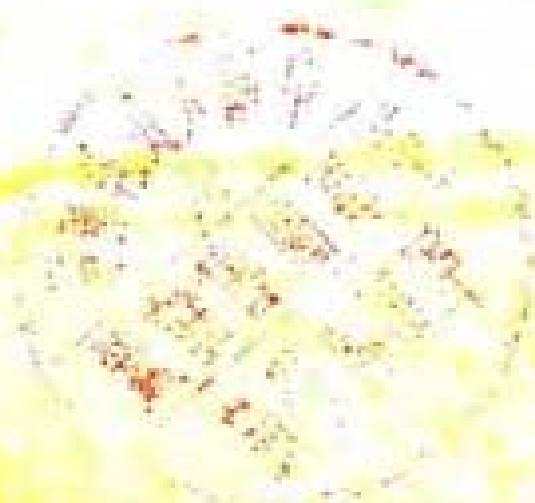
读者购书, 书店缺货或发现印刷问题, 请与发行科联系、调换

电话: (029)5251046(传真) 5233753 5307864

影响当今中国
发展进程的人

之七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滕文生：江主席的“常任”特别助理/1

在中国社科最高学府打下扎实的理论功底

一直工作在党的核心理论部门

担任江总书记的政治秘书

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

独木支撑还是三足鼎立？

参与发起加强党建的一系列活动

附：正确区分两种人权

沈国放：一生勤助的外交新星/31

好学不倦，老三届知青走进最高外语学府

进入外交部培养六种素质

任钱其琛秘书的岁月

“鹰派发言人”

在多边外交场合为中国呼喊

接待江主席出席联合国千年会议

加强全方位对美外交

蓄势待发的新星

附：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沈国放大使

在第54届联大一委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

戴相龙：中国金融大掌柜/75

走在时代潮流前边的人

朱镕基告诉戴相龙：要学会做恶人

直接领导会融改革

冷静思考亚洲金融风暴

成为建国以来最强有力的央行行长

金融业如何迎接全球化？

频出改革新招

央行行长的人民币情结

万众瞩目的利率市场化改革

号召时金融八大前沿课题进行研究

附：继续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

周瑞金：文才可用，心术尤正/113

十五年求学，三十年练笔

坦言自己曾反对过邓小平

“皇甫平”文动神州

义无反顾、不畏围剿

参与北约轰炸我国驻南使馆事件的处理

呼唤创新型人才

深入研究经济全球化

以多样化的形式发挥舆论的先导作用
附：放眼全球，呼唤创新型人才

洪虎：将门虎子，体改先锋/153

抓国企改革深受高层器重
我们要走向“私有化”吗？
资本是什么？
“内部股”纠偏
新省长上台就讲约法三章
火警是 119，省长公开电话是 118

王岐山：上下求索，永不言退/183

清华园走出来的工农兵大学生
人生道路的重大转折
转向金融投资业构成王岐山进入政坛的台阶
在建行大张旗鼓搞金融改革
空降广东身负金融改革重任
壮士断腕：主持广信破产的是是非非
粤海企业再起风波
指点笑评珠江经济
荣升体改办主任：“十五”主攻行业垄断

王缉思：钻进白宫心脏的中国行者/219

语言学家王力的儿子
科恩早慕王缉思大名
与亨廷顿叫板
中国需要务实的外交
一股恼人的秋风

台湾这副牌，美国怎么打

附：期盼和平的新世纪

迟福林：为中国改革点石成金的人/249

一本书让人们走近迟福林

海南开发的智囊

向西方思想家挑战

每当经济转轨，你总能听到他的声音

建议对上市公司进行有效改造

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钥匙

提出中国改革没有实质性突破

高西庆：归去来兮，指点中国证券迷津/273

朱总理看上高博士

他说股票发行要市场化

期待“二板市场”

呼吁：深港沪不要搞竞争

迎战张维迎

滕文生：

江主席的“常任”特别助理

滕文生毫无疑问的属于典型的中国高层智囊。他一直在党的核心理论部门工作，1964年他就进入有“理论喉舌”之称的《红旗》杂志社；1980年他被调入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任理论组的组长；1992年底他又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泽民总书记的政治秘书，以后进一步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

长期在中央核心理论部门工作的经历使得他对党的理论的发展脉络了如指掌，对政治理论的前沿动态也了然于胸。因此他提出的建议总能一语中的、切中肯綮，能得到中央领导的首肯和采纳。许多我们所熟知的政策，比如说“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战略地位的高度”、“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三个代表”、“两思教育”、“以德治国”等等，都有滕文生参与制订。作为江总书记的助手，他参与了中央的许多决策过程，主持了许多调研项目，参与起草了许多文件和报告，为许多决策贡献了自己的心智。

滕文生还注重理论、政策的阐释和推广工作。在这方面，滕

文生著述颇丰，从1980年起，他共写作和主编了9本有名的著作，至于他所发表的文章则是难以计数了。这些著述为党的理论和政策的推广和普及活动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江主席出国访问时，滕文生常常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特别助理”随行，所以他又被人戏称为“江主席的‘常任’特别助理”。江主席在国内外正式场合的精彩讲话，许多就出自滕文生这位大秀才的手笔。

在中国社科最高学府打下扎实的理论功底

滕文生于1940年出生于湖南常宁。湘南的生活相当艰苦，但滕文生却能做到在逆境中奋发，坚持不放弃学习，这为他以后命运的转机打下了基础。

“机遇只降临于有准备的头脑”，1960年9月，20岁的滕文生终于得到一个深造的机会，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学习。

中国人民大学是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经济管理科学为主的全国著名综合性重点大学，与北大、清华比肩而立。如果说，清华是中国最高的工科学府，北大是中国最高的综合科学府的话，中国人民大学则是中国最高的社会科学学府。目前，中国人民大学是获准通过国家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最多的高校，也是中国社科研究论文和著作发表最多的高校。“九五”期间，人大共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2008部，发表论文8031篇。国务院

学位指导委员会下辖 15 个文科学科指导小组，均聘中国最著名的学科带头人担任组长，目前有 8 个组的组长是人大的教授。作为新中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型综合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50 年来共培养了 16 万名各类专门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其中担任正处级以上领导职务的有 3 万多人，副部级以上领导职务的有 300 多人。滕文生就是其中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在党的理论的研究方面更具有传统的优势，全国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中有 60% 是中国人民大学培养的，这些人才主要出自马列学院和滕文生就读的人大中共党史系。

在人大的 4 年中，滕文生刻苦攻读，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为以后参与决策过程、提好政策建议奠定了基础。同时滕文生流畅的文笔、严谨的逻辑、飞扬的文采也是在人大的 4 年学习中培养起来的。

正因为如此，1964 年滕文生从人大毕业后一直不忘母校的恩情。他与原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原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袁木和桂世镛、现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主任魏礼群、以及原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等人一起受聘为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的兼职教授。他常常回母校举办讲座、指导学生。2000 年 10 月 15 日，中国人民大学举行命名组建 50 周年纪念大会，滕文生出席了纪念大会并向母校致贺。

一直工作在党的核心理论部门

1964年9月，滕文生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毕业，被分配到《红旗》杂志社工作。由于他工作积极，很快熟悉了业务，并于当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红旗》是我国著名的理论杂志，是“两报一刊”中的那“一刊”。

滕文生进入《红旗》后的第三年，“文革”爆发了，《红旗》被卷入风暴的中心，但滕文生并没有过深地卷入。1976年“文革”结束时，滕文生还是《红旗》杂志社的一名普通编辑。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大地回春转暖，滕文生也开始在理论界活跃起来。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郑重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滕文生在深刻领会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之后，与贾春锋一起合著了《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项保证》一书，该书于1980年出版，详细论述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内涵和意义。这本书使滕文生开始在理论界崭露头角。

1981年1月，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组建成立，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力群（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上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任研究室主任。研究室成立之初，邓力群在全国寻找高级研究人才，滕文生由于理论功底扎实、文笔生动流畅、政治立场坚定、在“文革”中理智清醒而被选中，成为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的第一

批人员，并担任研究室理论组组长。

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是与中宣部、中组部等平级的单位，主要职责是：负责重大政策的调查研究，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中央书记处交办的其他事项等。它是中央政策研究室的前身，是党中央决策的一个重要的调研和咨询机关。滕文生在其中担任理论组组长的重要职务，实际上就是在党中央的决策中起了主要智囊的作用。

这期间，滕文生一直在对前沿的理论问题进行思考，1982年，滕文生和贾春锋合著出版了《向历史和现实的实践学习：社会主义政治论集》一书。书中提出了他们对于社会主义政治的各种问题的看法。该书由红旗出版社出版，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

1985年，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邓力群牵头组建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滕文生受邀出任常务理事。此后，滕文生一直为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而出谋划策、奔走呼喊。

1987年9月十三大召开前夕，中央研究机构进行改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被取消，其职能改由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负责。滕文生也改任由中顾委委员邓力群同志组建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写作组”的副组长。在担任此职务期间，滕文生对这一课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主要研究成果见于法律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的、由滕文生主编的《反和平演变教育问答录》等著作。

1988年初滕文生开始担任中共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在中顾委时，滕文生曾帮中顾委副主任薄一波同志整理回忆录的文稿，其工作能力和理论水平受到薄一波同志的赞扬。1989年之后，滕文生又开始参与高层决策的咨议工作。1990年，中共中央十三届七中全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10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滕文生就参与了《建议》的起草。1991年1月，滕文生还专门主编了《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建议〉学习问答》，以使全国人民更好地理解《建议》的精神。

1992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召开，会上决定撤销中顾委。于是滕文生就不再担任中顾委秘书长一职了。

担任江总书记的政治秘书

考虑到滕文生的理论水平、工作能力和业务水平，1992年底中央选定滕文生担任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江泽民同志的政治秘书。从此滕文生就成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智囊。

党的十四大通过党章修正案和江总书记的讲话稿。这两个文件滕文生都是主要的起草人之一。

十四大的党章修正案中在政治方面提出了三个新观点，即“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和“加强党对人民军队的领导”。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三个观点正是滕文生一直著书立说所提倡的治国方略。对于前两个思想我们将在后文中详细阐述。

中国共产党在确立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的问题上从未动摇过，但是十二大党章和十三大的党章修正案中对于中国共产党对武装力量的领导都说得比较含糊，只是用“必须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这样的语言一笔带过。滕文生认为在新形势下有必要

在党章中明确这一问题，于是建议在党章的“总纲”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领导”这一规定。

在江总书记的报告中不但体现了以上三个思想，还提出了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大力开展反腐败斗争等党的建设的具体措施。1992年11月滕文生主编了《我国的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学习党的十四大报告论集》一书，深入细致地阐释了江总书记的报告的各方面思想。

1990年起，中美之间在人权领域的斗争一开始，滕文生就及时关注了这方面的动向，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人权思想。1992年12月，滕文生主编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百题解》一书出版。书中回答了有关人权问题的100个问题，阐述了我国人权政策的进步性，展示了我国人权状况的巨大发展，澄清了人们的种种疑惑。滕文生以他已发表的一篇文章《正确区分两种人权》为该书作代序。

1993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滕文生又参与了李鹏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政治部分的起草工作。1993年法律出版社出版了滕文生和魏礼群主编的《学习全国八届人大一次会议文件辅导百题问答》一书。滕文生为该书作序：《抓住机遇，又快又好地发展经济：学习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在这篇文章中，滕文生阐述了他在《政府报告》中提出的两个观点：一个是“五个必须”，即“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必须坚持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必须保持社会政治稳定的局面，必须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方针，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和发扬务实作风”。

第二个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滕文生在文中提出：“经济体制改革要同政治体制改革

相结合进行，做到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组和政府机构改革，是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加强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紧迫任务，也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这一观点在八届、九届政府在任期间一直指导着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工作。

滕文生一直十分重视加强党的建设，1995年他向江总书记建议开展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题的“三讲”教育。有关这方面内容我们在后文中将深入论及。

滕文生不但关注国内问题，而且也关心中国对外关系问题。从1997年起，江泽民主席在出访时一般都会要滕文生陪同。滕文生对外的身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特别助理”。从1997年到1999年，江主席的重要出访的重要讲话基本都出自滕文生之手。所以人们戏称滕文生为“江主席的‘常任’特别助理”。

当然，细心人也能发现一个身份的变化。1997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上滕文生当选为中央委员。1998年原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维澄改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于是滕文生升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样就导致滕文生在出访时身份的变化：1998年以前一律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特别助理”，而1998年以后称“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